

July 2024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The Renaissance* and “N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ingxing Wei
2273250966@qq.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Wei, Mingxing. 2024.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The Renaissance* and “N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1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自然的人生化

——《新潮》与新文学发生期的“自然”

危明星

摘要:“自然”作为重要的思想史观念,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新潮》同人与新文学发生史之关系的视角。《新潮》同人把“自然”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以写景诗为新文学的急先锋,但围绕“自然”与“人生”的辩驳也因此展开,他们以近代以来杂糅的自然观念为基础,在“自然”与“人生”的辩驳中提出自然的人生化。“自然”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写作对象与基本准则便以物质世界的自然为基点,生发出多重面向,并反过来深化了新文学论域中的“自然”。自然的人生化,是《新潮》同人对新文学自然观理论贡献的核心,也是其思想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

关键词:“自然”; “人生”; 《新潮》; 新文学

作者简介:危明星,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81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100029。电子邮箱:2273250966@qq.com。本文为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24-4-8]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0&ZD28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The Renaissance* and “N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Nature”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ovides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naissance* collective and the history of new literature. *The Renaissance* collective elevated “nature” as a fundamental narrative focus, notabl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landscape poetry, which marked the forefront of literary modernization. This initiative spawned a critical discourse juxtaposing “nature” and “life”, rooted in an amalgamation of contemporary natural philosophies. Through this discourse, the collective advocated for a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 concept positioning the material world as the cornerstone of new literary exploration. This conceptualization fostered a diversified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with “nature”, thereby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landscape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Renaissance* collective’s theorization on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stands as their sem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new literature and exemplifies their ideological evolution.

Keywords: nature; life; *The Renaissance*; new literature

Author: Wei Mingxing, Ph. D.,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in the Institut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hina Academy of Art, with research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Editorial Office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stitut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hina Academy of Art, 81 West Laiguangy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China. Email: 2273250966@qq.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Business Fees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2024-4-8), and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20&ZD280).

“自然”作为新文学发生期一个逐渐从文学实践过渡到理论自觉的观念,表征了新文学同人

对文学、思想与现实的多重反思和建构。从词源上看,中国古典语境中的“自然”多作为主谓短语

(即“自-然”)或形容词/副词使用,这些用法的核心内涵是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不借助任何外力,依靠自己内在的能量运动,是怎样就怎样”,后来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引申出“自然而然”之义。(池田知久 15)用来彰显事物存在状态的“自然”蕴含了古典中国把“自然的存在方式直接被理解为伦理的存在方式”的思维,“贯通着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条理-伦理’,进而催生了共同包括着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自然的天理’和‘天理的自然’这样的观念”。(沟口雄三 4—5)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然”概念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衍变,“Nature 词义演变的整个历史包含了大部分的人类思想史”(威廉斯 374)。①据研究,西方的“自然”(Nature)主要包括事物的基本性质、内在力量和物质世界三种较为普遍的用法,其分别出现于 13、14、17 世纪,各含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展开(威廉斯 372—379)。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清末民初的英华辞书开始在 Nature 的释义中加上“自然”,西方作为物质世界的自然慢慢成为“自然”的主要含义,随同西方实体意义上自然概念传入的,还有近代西方自然概念中包含的因果、数量、机械等科学主义意义上的观念。(王中江,《近代中国“自然”观念的诞生》197—206)

在新文学的论域中,“自然”主要指向的是作为物质世界的自然,不过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也携带着中国古典语境中作为万物存在状态的观念及其思想逻辑。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堪称文学革命旗帜的名文,无论是反对雕琢阿谀、充满滥调套语的文言文,还是提倡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或社会文学,都把“自然”作为语言形式与写作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进而挑战中国几千年以来桎梏国民身心的“自然的天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26—3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6—9)。如果说作为旗帜的这两篇名文还相对空泛,那么到了其学生《新潮》同人这里,“自然”作为新文学的重要标准便得到切实的实践与深化——以作为物质世界的自然为基点,他们已经把“写实、普遍、自然”(吴康 177)当作文学活动的重要准则并积极贯彻到对自然的书写中。与此同时,与大自然相对的另一重要写作题材——“人生”②,则把“自然”抛入《新潮》同人写作态度与思想转型

的辩难中。“自然”因与中国传统——尤其是隐逸传统的密切联系,似乎与新文学的追求背道而驰,“人生”则因贴近生活,似乎更符合新文学的诉求。这种新旧之争在时代转型的当口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暗含着新文学作者群所面临的思想转型难题。随着“自然”与“人生”论辩的深入,古今、中西缠绕的“自然”观念被《新潮》同人一步步剥离出来,重新确立起更加辩证且同一的新文学自然观。以“自然”为切入视角,一方面可以看出《新潮》同人对新文学自然观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则可以从理论主张探寻其背后隐含的新文学初期作者群的思想观念,丰富对新文学发生问题的讨论。

一、《新潮》白话写景诗中“自然”书写的意义及局限

新诗是新文学初期最具变革意义的文学实践,胡适 1919 年就在《谈新诗》中称其为“八年来一件大事”,并指出“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只有打破了“五七言八句的律诗”,“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谈新诗》1)。正是在形式解放的意义上,胡适充分肯定了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和俞平伯的《春水船》这两首写景诗,认为它们通过新形式展现了新诗在写作问题上新的审美趣味的确立。

在胡适的分析中,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傅斯年 138—140)中的“仿佛像大车音波,漫漫的工——东——啮”这句诗,因为采用了新式标点破折号,才能最贴切地摹写出连续悠长的声音,做到“完全写实的地步”(胡适,《谈新诗》1);对于俞平伯的《春水船》(俞平伯 27—29),胡适则截取其中两段,认为“这种朴素真实的写景诗乃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胡适,《谈新诗》1)。“朴素”和“真实”是这句评价中的两个关键词。所谓“真实”,指的是客观写实地描画真实的自然和生活,也即写作手法和对象的双重真实性;而“朴素”一词则颇值得推敲。胡适在文中援引杜甫《滟滪》一诗“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他认为上联的“江天漠漠鸟双去”本是写实描画的好诗,但为诗体的

工整而接续的“风雨时时龙一吟”却“坏了”。因为在他看来,诗歌应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确切地说应当是用自然语言写就的,五七言诗却“不合语言之自然”(胡适,《谈新诗》1—2)。由此可以推断,胡适所谓的“朴素”,指的就是俞平伯打破形式束缚,以简洁明了、质朴自然的语言对对象作如实的描画,正所谓“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30)。

胡适从形式立论,发掘出《新潮》上两首写景诗的新质,而这种新形式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新精神和新内容”。傅斯年和俞平伯在对自然作“写实的描画”时,人与大自然产生了物理与审美的距离,“自然”被对象化,“人”站在旁观的立场观察大自然。这种“自然”观念,是在西方科学观念影响下直接去面对“大自然”寻求真知、“科学”地审视自然的观念(王中江,《中国‘自然’概念》17)。在科学思维的指导下把“自然”对象化,精细、如实地描画风景是其时新文学界的共识。这种写景的方式符合新文学“以真为要义”的宗旨,挑战了文言文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弊病。傅斯年以白话摹写声音“工——东——啮”,具象、精细地摹写自然物,一改中国传统写景方式之流弊。如果说傅斯年笔下的自然物是对象化的自然物,诗人是从科学观察的客观立场审视自然的,那么杜甫笔下的自然物则是主观的、印象式的。

傅斯年的写景诗只是部分诗句体现出诗人自然观的转变,俞平伯的《春水船》则整体上体现出“新精神和新内容”。全诗以诗人漫步时的见闻为线索,先后呈现出沿河春光、渔船及归途三个场景,而最能体现“新精神和新内容”的是诗人对渔船的细致描画与精心结构。破旧的渔船、衣衫褴褛的渔民、又憨又蠢的小孩与可爱的春光形成有趣的张力,诗人说渔民“‘泛家浮宅’的生涯,偏是新鲜、干净、自由”。“新鲜、干净、自由”三个褒义词体现出诗人把可爱春光与丑陋渔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风景区质化的努力。通过精心结构两种风景,诗人在自然中发现了平民,这种发现使得诗人在归途陷入沉思。古典的山水自然只把大自然作为美的对象,或在自然中隐遁,或游乐、鉴赏、品悟,对应的是诗人内心的情志与“小我”,俞平伯

则冲破自我,把抒情主人公放到旁观的立场上,不仅看到了自然的美,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自然中的平民。“新鲜、干净、自由”的平民作为自然春光的一部分,代表了俞平伯审美观念的转型,诗人不再到自然中寻找“安居之地”,平民“浮家泛宅”的生涯具有了与自然同等的审美地位,自然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天人合一”的关系——人与自然不再一一对应,“自然的天理”-“天理的自然”的思维方式被俞平伯打破了,诗人已经跳出自然之外,以旁观、理性和更为开阔的视野打量自然。

西方近代以来科学自然观的引入以及对其写景方法的借鉴,为新文学挑战中国禁锢国民思想的文言文提供了武器。但此时这种挑战却并不彻底,最明显的一点是新诗作者的写景方法中依然保留了不少传统的写法。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从整体来看,像是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展开的画面是诗人从永定门西城往外看到的景色,意象的直接铺展与抒情主人公的隐匿,都是古典诗歌的写法,而诗歌整体体现出来的旷远、荒凉的意境,也颇得古典诗歌美学的趣味。俞平伯的另一首诗《冬夜之公园》(俞平伯 138),无论是韵律结构还是自然描写,也都带着诗人“经验性”地观照自然的传统影响,诗人后来也承认这些诗染上了“很浓厚的旧空气”(俞平伯,《做诗的一点经验》62)。

1922年在给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作序时,胡适也指出“老一辈”以及最先出道的少年诗人的新诗仍深受旧诗的影响——“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胡适,《“蕙的风”》2)。其实,无论是“旧空气”还是“旧诗词的鬼影”,指向的并非写景诗中的自然本身,而是经由自然的审美结构所折射出的传统思维方式。如罗家伦的《雪》(罗家伦 136—137)在摹写自然景物雪时,无论是形式还是审美结构,都落入古典诗词的俗套,他后来反思道:“‘啸傲风月’‘兴而比也’”的方式“流露于不自然而然”,“其将来的流弊有不可言状”(罗家伦,《近代中国》25)。这句话揭示出“旧诗词的鬼影”背后的实质:新诗描写自然的方式仍显稚嫩,只能套用旧诗的俗套,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文言文矫揉造作的形式背后禁锢思想、人性的伦理道德体系仍有复辟的危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白话写景诗的解放意义,新文学的“自然”

标准更是难以贯彻落实。“自然”能否入诗,如何入诗,古典的山水自然能否作为思想资源,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为《新潮》同人进一步反思“自然”留下了更多思辨的空间。

二、新文学场域中“自然”与“人生”的辩驳

作为《新潮》的主编和核心人物,傅斯年最先对《新潮》上的写景诗展开反思,并引导了《新潮》同人的文学创作倾向,进而推动了新文学场域中的“自然”与“人生”之辩。1919年,鲁迅在给傅斯年的回信中指出《新潮》上的诗歌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作风有点单调”,并建议《新潮》可以翻译外国的诗(鲁迅,《通信》225)。傅斯年在复信里抓住了鲁迅的核心要旨,回应称《新潮》的诗歌犯了“离开人生”的“单调的毛病”(傅斯年,《通信》226)。傅斯年所谓的“离开人生”对应的正是《新潮》的写景诗,这份通信对新诗的探讨,关系到新文学的整体目标和追求。

在回溯新文学的发生时,胡适曾指出新文学的中心理论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导言》18)正是受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主张的启发,傅斯年进一步将新文学表述为表现人生的文学(傅斯年,《白话文学》193)。罗家伦也指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罗家伦,《什么是文学?》51)由此可见,“社会人生”才是新文学极力倡导的表现对象,自然山水则因关涉传统的隐逸文化,远离现实人生,一开始就受到傅斯年的批判:

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绘画中山水最多最精,鲜有绘人事者;绘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198—199)

傅斯年的论述抓住了中国传统艺术中自然的“病根”:不与社会和实际人生发生关系。这事实上是把“自然”作为了“陶情养性的一件卫生术”,诗人“对于人生的指责和批评,全没有尽他们的

天职”(周无 39)。这种自然观对应的是隐逸、遁世的人生观,违背了新文学描写社会人生的宗旨。

与此同时,傅斯年等人在《新潮》上转载周作人的《背枪的人》《京奉车中》两首诗,以引导白话诗的趋向,并在按语中表示要以周作人这两首诗为“榜样”,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傅斯年,《通信》225)。周作人的这两首诗之所以受到《新潮》同人的推崇,正是因为其在题材和主旨上鲜明的社会性取向。除了周作人的这两首诗,《新潮》杂志同期的其他几首诗歌,如傅斯年的《前倨后恭》《咱们一伙儿》、叶绍钧的《爱情》、康白情的《鸡鸣》等诗,也避免纯粹的“自然”描写,“自然”于是从这些白话诗中慢慢淡出。

但鲁迅的建议与新文学“社会人生”的整体目标与追求,仍然不足以解释“自然”何以成为一个与“人生”相对的概念,而傅斯年的《心悸》(傅斯年 59—60)和《心不悸了》(傅斯年 60—61)及其相关评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对立背后的思想动因的视角。

《心悸》和《心不悸了》都是直面现实人生的诗作。前者控诉“进化上万年”却依旧“人吃人”的世界;《心不悸了》是对《心悸》的回应,“我”之所以“心不悸了”,是因为看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上帝创造了世界,但人却能改造世界,而这一点正是《新潮》同人人生观的哲学基础。罗家伦由此敏锐地发现傅斯年对《新潮》初期写景诗的突破,赞赏该诗为“‘Humanized’的诗”(罗家伦,《“批注”》61)。罗家伦将傅斯年这两首诗的宗旨概括为“Humanized”,即“人道化”,而“人道化”与“Humanism”一词具有密切关系,^③傅斯年在介绍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Schiller(失勒,现译作席勒)时就用到了“Humanism”一词:“他的哲学是人化主义(Humanism)——就是哲姆士博士的实际主义。”^④由此可见,“人生”在《新潮》同人的语境中乃是实际主义哲学的同义语,他们想用实际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偏重形式、忽略实际的思想,反对不与社会人生发生关联的浮泛知识。实际主义哲学作为一种20世纪的“‘科学’的哲学以至科学方法本身”(汪晖 1002),为新文学“人生”的倡导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成为《新潮》同人“自然”与“人生”对立的理据。

但把“自然”与“人生”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自然”与新文学的关系问

题,简单地以“社会人生”压制“自然”,终于引发了《新潮》同人的思想危机。傅斯年发表于1920年的《自然》(傅斯年,《自然》103—104)一诗,鲜明地体现出他其时思想的焦灼与紧张。在傅斯年的体认中,“人生”有理,但“自然”更有滋味,而这滋味是其精神的皈依。“自然”与“人生”的冲突,在他这里化作了“趣味”与“理”的冲突,如果说“人生”代表的是新的知识和信仰,那么作为精神皈依的“自然”,在傅斯年这里已经溢出实体的自然界的概念,抽象化为某种直觉、本能。正如王汎森所言,这首诗“表现了他对‘理论’和‘直觉’、‘人生’与‘自然’之间的两难思绪。‘理论’和‘人生’代表着他和他的国家所努力争取的目标;而‘直觉’和‘自然’代表他和他的同胞内心最深处的体验”(王汎森 57—58)。

何为傅斯年“内心最深处的体验”?他在1920年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时曾有所吐露:“我在国故时代,念书只为爱他,读诗只为爱诗,到颇有些‘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后来由于国故的见识“不切今世”,转向西学,但因为对西学抱着“求合实际、求有成功的心思”,“总很难和学问生深切的交情;不能神游,所以读书总觉不透彻”(傅斯年,《留英纪行》)。由此可见,对于学问,傅斯年强调的还是一种“非功利”的心理,“自然”恰恰就蕴含着这种以趣味为导向的“非功利”的空间。中国古典山水自然传统和西方“俄耳甫斯”式的自然观中蕴含的对自然的非功利的态度,正契合傅斯年等《新潮》同人的直觉与本能,为《新潮》同人再造新文学的自然观提供了思想的根基。

三、《新潮》同人“自然”观的成型

(一)“自然美”与“人化的自然”

1920年,傅斯年和俞平伯在英国留学的途中关于“自然”和“人生”的辩论,终于为《新潮》同人新的自然观的生成提供了契机。傅斯年在辩论中提出“自然美”这一重要概念:“自然的美引人,凭我盲想,有三层:形态的美引人的文学思想;组织的美引人的科学思想;意义的美又常助人宗教或哲学思想的发达。”(傅斯年,《通信》233—234)傅斯年以感性、理性、经验三个面向来阐发“自然美”的意义,并以此全面论述自然与人的关

系。结合傅斯年的个人经历与思想历程,形态的自然美当来自其直观体验,他一路南下,不同的景致触发了他对自然美的异质形态的感悟,这些切实而新鲜的经验,使其重新面对古人的良辰美景式的单一审美体验。组织的美基于现代学科分化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这也是《新潮》同人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观念,这种观念把自然视为“科学和技术的对象”,以“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窥探自然的秘密。但傅斯年的创见在于他以“组织美”来把握科学理性审视下的自然,一反机械的科学主义的态度,而这一点在意义的美一层体现得更清楚——他把自然美提高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以超越性的视野把自然美进一步提升,使自然美多了一重人文与精神的内涵。

“美”是傅斯年“自然美”概念的核心要义,他指出美感具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爱好美感的心理是匀净的”,“自己的利害与别人的利害一致”,“目的平分散到时时刻刻”而非“重在最后的获得”,爱好美感能够忘了“自我”而“得我与物的公平”,美感因没有利害的观念而具有“创造的力量”……概括起来,美感的核心要旨在于非功利,这种非功利的心理正是“趣味的渊源”,而“趣味是使生活所以为生活者”,“人生与趣味本有拆不开的关系”。通过对美感的阐释,傅斯年重新审视古人的“离群索居”、寄情自然,认为“他们不是毫无道理”——“他们能明白美感,领受美感,所以才能把人生的一部分放在自然身上”,即所谓的“人生与自然相遇于美感之内”。由此,傅斯年提出了两条使自然与人生结合的途径:一是以人生自然(To personify the nature),就是不使自然离开了人生;一是以自然化人生(To naturalize the nature),就是不使人生循恶浊的物质。傅斯年认为,以上两条的结合就是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就是“人的文化”。^⑤

古人的寄情自然虽不无道理,但在傅斯年看来,他们对自然美的理解仍显狭隘:

自然的美,固因时因地而为浅深不同的表现。但极枯薄的地方,也有美的境界。[……]我觉得中国文人只是在良辰美景上用工夫,是由于不知道不良辰的良,不美景的美,这是他感情浅薄处。(傅斯年,《通信》233—234)

傅斯年显然已经赋予自然美更宽泛的意涵,所谓“不良辰的良”“不美景的美”,正是经其重新打量后发现的超出古典趣味的自然之美。作者认为,自然美不仅存在于良辰美景中,也存在于枯薄的地方,经由美感的中介,传统的以良辰美景为单一审美对象的自然观被傅斯年打破了。传统文人只在良辰美景上用功夫,是因为只把自然视作陶情养性的卫生术,而在傅斯年这里,自然不能离开人生,对自然的审美背后是对社会人生的更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同时,由于把自然视作审美的对象,其人生观就升华到超越性的层面,即所谓“不使人生循恶浊的物质”。也就是说,对自然的更开阔的理解以及现代美感的引入,使“自然”和“人生”成为一对辩证的概念。

如果说傅斯年通过提出“自然美”,重新确立了看待自然的方式,拓展了自然美的内涵,那么俞平伯则在此基础上,从文学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了如何描写自然:

所以我并不反对做描写自然界的诗,我是反对仅仅描写自然……我想把自然界摆入“诗囊”,所以要把他加些情绪想象的色彩。原来自然和人生本不是两个东西,人类本是自然界一小部分,所以就人化了他,其实还是自然的自然。(俞平伯,《通信》235)

他认为自然可以入诗,但反对仅仅描写自然。针对新文学初期纯粹描写自然的白话诗,新文学的倡导者一度把“自然”与“人生”对立起来,认为“人生”比“自然”更重要。但经过这次辩论,俞平伯的诗歌创作主张渐渐清晰起来,俞平伯依然强调诗歌/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但“为人生”并不代表不能描写“自然”。其实,在这封信中,与其说俞平伯强调的是“人生”,不如说他强调的是情绪和想象——一种新的描写自然的方式:作家面对自然界,应该摒弃科学的机械的自然观,以情绪和想象为主导,“把自然界和社会的状况做背景”,调和自然与人生,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二) 从“人化的自然”到人性的自然

傅斯年和俞平伯关于“自然”“人生”的辩驳

以及“自然美”“情绪和想象”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如何看待自然、如何描写自然的问题。无论是傅斯年的“自然”与“人生”互相化合,生成“人的文化”,还是俞平伯强调的以情绪和想象为主导,生成“人化”的“自然”,其背后的关切都是社会人生,而社会人生的内核是“人性的自然”。

文学革命中白话文的倡导对应的理论诉求之一就是自然的语言形式来吁求自然人性,以此对抗桎梏身心的伦理道德。傅斯年就曾批评楚辞与《诗经》的“真景,真情,真趣”相比,一味追求意思、语言乃至字面的奇特,“起初仅仅是不自然,结果乃至无人性”(傅斯年,《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142)。在《新潮》同人的主张中,文学应该是天然的、符合人性的,表现出自然的美来,而非夸饰与矫揉造作,所谓“文学之为用,当使人生一种自然的有利的兴趣,不可使人生一种矫揉的有害的兴趣”(陈达材,《文学之性质》89)。文学要面向社会人生,需要具备三种高贵的德性——“写实、普遍、自然”。“因为‘写实’所以没有铺张粉饰的毛病;因为‘普遍’所以没有阶级上的分别;因为‘自然’所以没有矫扭造作的行为”(吴康 177)。

如果说上述理论主张溯源至《诗经》,主要从文学形式上的“自然”来挖掘人性的“自然”,那么叶绍钧的短篇小说《春游》,则以形象的方式,揭示自然美对人性解放的重要意义。在小说略显粗糙而又概念化的勾勒中,女主人公本是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她的生活很简单,又很不自然”。一次偶然的春游机会,优美的春光忽然给了她改造自己的契机,“自然,活泼,高洁”的景物与主人公融为一体(叶绍钧 158)。小说以此传达出作者的一个重要理念:自然美具有改造不自然的社会生活中扭曲变形的人性的潜能,由自然美可以通达人性的自然。

结语:自然的人生化

新文学初期,文学创作实践明显落后于理论的倡导,“自然”观念的落实便体现出这一点。《新潮》同人正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回应新文学发生期的“自然”观,自觉地把师长的理论倡导落实到文学实践中。而也正是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内部的张力逐渐浮现:新文学在创作

题材上是书写自然还是面向人生?新文学家如何处理自然本身所携带的传统因子与西方因素?在这些矛盾之下,“自然”进而由文学的新旧之争导向新文学家主体的思想困境。可以说,新文学发生期“自然”理论的多重矛盾,在作为学生一代代表的《新潮》同人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显现。也正是在此多重困境之中,以杂志的骨干傅斯年和俞平伯为核心,《新潮》同人由创作实践进一步扩展至理论反思,以近代思想史上杂糅的“自然”观念为基础,一步步剥离出不同的层次,再造新文学的自然观,调和了看似对立的“自然”与“人生”,提出了“自然”的“人生化”。他们一方面纠偏此前回避自然描写以呼应新文学诉求的激进方式,并调整了以科学自然观为基础的具象、精密、写实的写景方式,加入情绪、想象等手段描写自然,突出自然“人化”与主观的一面;另一方面,现代“美感”的引入,扩充了古人以良辰美景为单一审美对象的自然观,“自然美”这一核心概念打通了“自然”与“人生”的隔阂,使人性成为理解自然的核心。由此,“自然”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写作对象与基本准则便以物质世界的自然为基点,在《新潮》同人这里生发出多重面向,各面向彼此交织,反过来深化了新文学论域中的“自然”。自然的人生化,正是《新潮》同人对新文学自然观理论贡献的核心,也是其思想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潮》存续时间较短,其引发的系列关于“自然”的讨论很快便随着杂志的终刊而画上句号,这一重要的论题继而在郭沫若、宗白华、朱自清、闻一多等新诗创作者那里得到持续的深入讨论,这是《新潮》同人的局限所在。

注释[Notes]

- ① 就“自然”与西方思想史的关联而言,科林伍德、阿多等学者曾作了出色的研究,前者勾勒出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时期的自然观,它们分别是希腊的有机自然观、文艺复兴时期的机械自然观和现代的进化自然观,后者则区分出“普罗米修斯态度”(实验、探索、征服自然)与“俄耳甫斯态度”(审美、沉思、敬畏自然)两种自然观。参罗宾·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皮埃尔·阿多:《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张卜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 ② 如朱自清就认为“初期的作者似乎只在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里去寻找诗的感觉”。参朱自清:《新诗杂话》,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5。

③ 可参考方朝晖:《“人本主义”一词考源》,《哲学动态》10(1992):42—43。

④ 傅斯年:《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新潮》1.3(1919):188—192。《新潮》同人当时普遍用“实际主义”来指代“实用主义”。

⑤ 傅斯年:《美感与人生》,《晨报》,1920年7月7—10日第7版。Mill:即约翰·穆勒(又译作密尔),英国哲学家,《On Liberty》初版于1859年。严复最早将该书翻译引进,即《群己权界论》,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傅斯年阅读的应该是英文原书,他聚焦于该书的序言,阐发其对“美感”的理解。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达材:《文学之性质》,《新潮》1.4(1919):86—89。
[Chen, Dacai.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The Renaissance* 1.4(1919): 86-89.]
-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6(1917):6—9。
[Chen, Duxiu.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New Youth* 2.6(1917): 6-9.]
- 傅斯年:《通信》,《新潮》1.5(1919):225—226。
[---. “Letter.” *The Renaissance* 1.5(1919): 225-226.]
——:《通信》,《新潮》2.4(1920):233—234。
[---. “Letter.” *The Renaissance* 2.4(1920): 233-234.]
——:《自然》,《新潮》2.3(1920):102—104。
[---. “Nature.” *The Renaissance* 2.3(1920): 102-104.]
——:《留英纪行》,《晨报》,1920年8月6、7日第7版。
[---. “On the Way to Study in the UK.” *Morning Post Supplement* 6, 7 August 1920.]
——:《心悸》,《新潮》2.2(1919):59—60。
[---. “Palpitations.” *The Renaissance* 2.2(1919): 59-60.]
——:《心不悸了》,《新潮》2.2(1919):60—61。
[---. “Palpitations Are Cured.” *The Renaissance* 2.2(1919): 60-61.]
——:《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新潮》1.4(1919):140—148。
[---. “Review of Two Works on the *Book of Songs* by Zhu Xi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Renaissance* 1.4(1919): 140-148.]
——:《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新潮》1.2(1919):138—140。
[---. “Night Scenery on the Yongdingmen Walls in Late Autumn.” *The Renaissance* 1.2(1919): 138-140.]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1.2(1919):198—199。
[---.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

- Circle." *The Renaissance* 1.2(1919): 198-199.]
-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5(1919): 192—198。
- [---.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ical Reform." *The Renaissance* 1.5(1919): 192-198.]
- 沟口雄三:《〈中国的思维世界〉题解》,孙歌译,《中国的思维世界》,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9。
- [Mizoguchi, Yuzo. "Understanding *The Thinking World of China*." Trans. Sun Ge. *The Thinking World of China*. Eds. Mizoguchi Yuzo and Kojima Tsuyosh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06. 3-9.]
- 胡适:《“蕙的风”》,《努力周报》21(1922):2—3。
- [Hu, Shi. "Hui's Wind." *Effort Weekly* 21(1922): 2-3.]
- :《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32。
- [---. "Introductio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cted Works on Theory Construction*. Shanghai: The Young Companion Books. 1935. 1-32.]
-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上海1919)》,纪念号第5张(1919):1—4。
- [---. "Discussion of New Poetry: A Major Event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Weekly Review (Shanghai 1919)* 5(1919): 1-4.]
- :《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5(1917):26—36。
- [---.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Literary Reform." *The Renaissance* 2.5(1917): 26-36.]
- 池田知久:《中国思想史中“自然”的诞生》,田人隆译,《中国的思维世界》,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0—45。
- [Ikeda, Tomohisa. "The Birth of 'Nat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Trans. Tian Renlong. *The Thinking World of China*. Ed. Mizoguchi Yuzo and Kojima Tsuyosh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06. 10-45.]
- 罗家伦:《〈心悸〉〈心不悸了〉“批注”》,《新潮》2.2(1919):61。
- [Luo, Jialun. "Annotations to 'Palpitations' and 'Palpitations Are Cured'." *The Renaissance* 2.2(1919): 61.]
- :《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5(1920): 6—31。
- [---.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New Tide* 2.5(1920): 6-31.]
- :《雪》,《新潮》1.2(1919):136—137。
- [---. "Snow." *The Renaissance* 1.2(1919): 136-137.]
- :《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1.2(1919): 40—51。
- [---. "What Is Literatur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New Tide* 1.2(1919): 40-51.]
-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Trans. Wang Xiaob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Wang, Hui.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王中江:《中国“自然”概念的源流和特性考论》,《学术月刊》9(2018):15—34。
- [Wang, Zhongjiang. "Chinese 'Nature': Its Meanings and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Monthly* 9(2018): 15-34.]
- :《近代中国“自然”观念的诞生》,《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方维规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89—229。
- [---. "The Birth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odern China." *Idea and Methodology: Cultural Politics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Modern China*. Ed. Fang Weigu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9-229.]
- 吴康:《我的白话文学研究》,《新潮》2.3(1920): 173—178。
- [Wu, Kang. "My Study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The Renaissance* 2.3(1920): 173-178.]
- 叶绍钧:《春游》,《新潮》1.5(1919):158—159。
- [Ye, Shaojun. "Spring Excursion." *The Renaissance* 1.5(1919): 158-159.]
- 俞平伯:《春水船》,《新潮》1.4(1919):27—29。
- [Yu, Pingbo. "Boats on Spring Water." *The Renaissance* 1.4(1919): 27-29.]
- :《通信》,《新潮》2.4(1920):234—235。
- [---. "Letter." *The Renaissance* 2.4(1920): 234-235.]
- :《做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4(1920):62—64。
- [---. "Some Experience of Writing Poems." *New Youth* 8.4(1920): 62-64.]
- :《冬夜之公园》,《新潮》1.2(1919):138。
- [---. "The Park in a Winter Night." *The Renaissance* 1.2(1919): 138.]
- 周无:《诗的将来》,《少年中国》1.8(1920):36—43。
- [Zhou, Wu. "The Future of Poetry." *Young China* 1.8(1920): 36-43.]

(责任编辑:张均)